

看世界

□ 原洋

算算奥运经济账

如果说“注意力”是这个时代的抢手资源，那么奥运会“抢夺”注意力的能力着实惊人。刚刚闭幕的巴黎奥运会自开幕以来便争议不断，却丝毫不影响全球半数人口观看比赛，创下奥运收视率新高。

如此巨大的流量“蛋糕”，引来众多企业掘金赛场。不过对于奥运主办方而言，吸睛未必代表吸金——奥运会有一本自己的经济账。

翻开2000年之后的夏季奥运账单，你或许会惊讶：除了悉尼、北京两届奥运会外，其他几届奥运会都是亏损的。就目前情况看，本届巴黎奥运会的盈利前景同样不容乐观。预算91亿欧元、收入约50亿欧元，尽管巴黎奥组委想尽办法控制成本，大到充分利用现有场馆、不建设摆渡车运输系统，小到奥运村无空调、多素餐等，把省钱细化到方方面面，但多半还是难逃亏损的结局。

奥运会为何烧钱，又如何赚钱？“亏本”的奥运会还值得办吗？奥运会这本经济账究竟该怎么算？

一切还得从奥运会的商业起点——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说起。

在1984年以前，申办奥运会的国家压根没想过靠奥运会赚钱，非但不赚钱，还得连续贴钱近10年。主办城市决定申办后，需要花钱竞标；取得申办资格后，还需耗时7年并花更多的钱筹备奥运会。

这些钱主要用于建设支出和运行支出两方面。前者占大头，主要是体育场馆、奥运村、媒体村及相关设施的建设改造维护费用；后者则是一次性支出，包括举办赛事与开闭幕式、交通与安保、兴奋剂检测等各项服务支出。

纵观这些年，主办奥运会少则花费数十亿美元，多则上百亿美元，且几乎所有主办国出现了超支。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，自1960年罗马奥运会以来，历届奥运会在考虑通货膨胀后的平均超支率约达180%。也就是说，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，平均要花掉超过申奥预算近2倍的钱。

这种烧钱法令不少城市头疼。比如，1976年举办奥运会的蒙特利

尔就吃尽了苦头。由于办会亏损严重，蒙特利尔市政府债台高筑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向当地300万市民新增“奥运特别税”，直到2006年才还清债务。

为了15天的奥运会，整个城市负债30年，试问谁还愿意冒这个风险？以至于1978年，洛杉矶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，自动成为1984年奥运会举办地。

对此，一大批洛杉矶市民不干了，他们担心重蹈蒙特利尔覆辙，逼着政府放弃对奥运会提供资金支持。谁承想，这一逼，反倒逼出一场奥运商业改革来。

没有政府补贴，不能发行彩票……临危受命的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彼得·尤伯罗斯凭借一系列天才般的商业运作，实现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次盈利，其开创的诸多商业模式一直沿用至今。

那么，尤伯罗斯是如何实现盈利的？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把“饥饿营销”带进奥运生意场，并做到极致。

媒体转播费、商业赞助费以及门票费用——这是尤伯罗斯锻造的盈利“三板斧”。其实在此之前的奥运会也使用这3种手段，只不过获利稀少，杯水车薪，难抵亏损。

到了尤伯罗斯这里，电视转播权卖价低廉，那就改为竞标才能享有的“独家转播权”，只要有意竞标就先缴纳75万美元保证金；商业赞助又杂又乱，那就改为只和有限的赞助商合作，在每个限定行业里，只有一家赞助公司有资格成为奥运会指定赞助商，且赞助费不得低于400万美元；就连原先多为赠品的奥运会门票，也改为阶梯票价，一张黄金座位票价可达2.5万美元……

任行业巨头相争，奥组委轻松得利。

为了打败百事可乐，可口可乐豪掷1260万美元；为了挑战柯达龙头地位，日本富士开价700万美元。多年以后尤伯罗斯回忆，在接到可口可乐公司的报价书时，他故意装作漫不经心，飞快扫过密密麻麻的条文，直奔最后一页：“八位数！那么多圆圈，这不正是我喜爱的圆圈吗！”深谙人性的尤伯罗斯，瞄准的正是企业的竞争心理。

最终，洛杉矶奥运会盈利2.5亿美元，改写了奥运会的商业历史。直到今天，尤伯罗斯的“三板斧”依旧是奥运会最赚钱的途径，能为总收入贡献五成或更多。

有人说，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运会，而尤伯罗斯挽救了奥运会。

诚然，2.5亿美元的收益不算多，对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实际效用可能并不大。但是能让主办国收支大致平衡，已经足够各国重拾办奥运会的信心了。

毕竟，数十年来奥运会之所以被看重，不仅在于彰显体育精神，也在于拉动经济、改善城市、提振国民信心、树立国际形象等长期综合价值。

正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、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于韩国、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于中国，3场奥运会见证着这3个亚洲国家的崛起与经济的腾飞。

彼时，东京奥运会结束后4年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；汉城奥运会举办当年，韩国创下12.4%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纪录；北京奥运会举办2年后，中国经济总量更是超过日本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…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很多，奥运会也是其中之一。

哪怕实现不了经济腾飞，大部分主办国在筹办奥运会期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以往。从宏观经济视角看，这是因为奥运会带来的额外需求，能够带动供给、刺激经济。

那么这是否意味着，办奥运会总能带来良好的长期效益？

答案是不一定。“后奥运效应”更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，拉动经济的另一面，是陷入低谷。

实际上，1984年以后也并非每届奥运会都能盈利，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赛后经济滑坡。在筹备期间大兴土木，但本地需求有限，就容易产生赛后场馆空置、维护成本高昂等情况，再加上投资萎缩、债务高企等，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经济问题。

究其根本，经济腾飞还是陷入低谷，关键要看主办国自身的发展情况。

北京、汉城、东京奥运会之所以产生远超预期的收效，是因为这些地区本身处于欣欣向荣、快速发展的阶段。蓄势待发的“城市们”只差一张通向世界、展示自身实力

的名片，而奥运会恰好充当了这个契机。由此，经济腾飞的序幕拉开，奥运会与这些城市和国家实现了相互成就。

换言之，地区经济、世界经济影响着举办奥运会的综合效益。这些年，申奥城市肉眼可见地变少，与人们印象中各国争相办奥运会的情形大相径庭，又何尝不是对当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映？

当然，不能仅凭经济效益评判一场奥运会，这是对体育赛事的苛求。在奥运赛场，人们更加期待的是挑战极限的拼搏。



悦读

指数型增长的

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一国经济陷入停滞或者小幅波动已成常态。伴随工业革命推动技术发展，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，增长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，而是呈现出一种加速状态。这种增长方式往往被称为指数型增长，或者乘数效应。

英国技术思想家阿奇姆·阿扎尔在《指数型技术重塑世界》一书中，对这种增长方式作出了深入分析。在他看来，任何一种技术，当它实现“功率”翻番的同时，成本却不断下降，就可以将其称为指数型技术。以摩尔定律为特征的芯片技术正是典型的指数型技术。1965年，英特尔创始人戈登·摩尔就注意到，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。这意味着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计算机的性能就可以提高一倍，同时成本却保持不变。它驱动着计算、能源、生物和制造等诸多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。

书中提出，当前世界正处于指数型发展之中，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推动力，能够使企业业务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，从而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。

阿奇姆·阿扎尔认为，指数型技术开始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。2010年，智能手机销量为3亿部；到2015年，这一数字已达到15亿部。2011年，世界上最大市值的公司首次不是能源公司，苹果公司的市值在几周内便超越了埃克森美孚。2016年初，苹果、腾讯、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和脸书这6家依靠呈指数型发展的数字技术建立起来的公司，跻身全球十大公司行列。

如今，我们正在见证计算、能源、生物、制造这4个领域的多项突破性技术所产生的影响。每个领域的新兴技术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应用。不断增长的算力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用途，基因工程可以用来培育微生物、帮助我们研制效果更好的药物；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制造出精密的汽车零件，还能复刻出人体器官。

随着创新技术的相互作用，它们也改变了诸多经济领域。当前，智能手机已经取代了许多其他消费设备，包括相机、随身听、计算器、日记、手表和街道地图。人们的购物方式和支付习惯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。这就是通用技术的力量，它们的影响不可阻挡地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另一个地区，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然而，《指数型技术重塑世界》也列举了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风险，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加剧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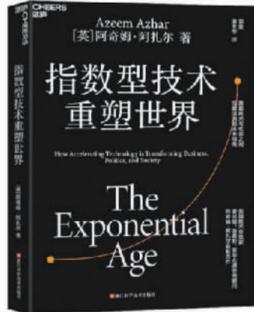
由技术引起的失业问题，以及对现有的监管体系和社会福利的挑战等。人的习惯、组织的惯性、制度的更新和变革却无法及时跟上，两者之间会形成日益扩大的鸿沟。此种“指数鸿沟”本质上是不同发展速度之间形成的差距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商业、贸易、就业等多个领域的各种问题。

比如，伴随平台型企业发展的共享经济快速发展，将工作在平台上进行分配，解构了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一系列围绕工作的规则：保障（社保）、最低工资、雇用责任等。在此情况下，平台型企业内部的员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。那些在高科技平台型“大厂”中掌握最新技术的人员，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工资、更灵活的工资结构；而在算法被动驱使下的那部分人，却难以享受到平台经济带来的机遇。

阿扎尔认为，技术的发展并非不可控制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主动地利用和引导技术。他强调，要缩小“指数鸿沟”，我们必须转变思维，认识到人类有能力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，并在必要时通过监管来应对技术带来的意外影响。

比如对于公司而言，只有理解新型算力并为之做好计划，才更有可能在指数时代占据有利位置。已有科技公司积极建立了全面、应用广泛的云基础设施，其丰富的仿真算力资源使其能够在全球任何角落随时开展研发工作。当前，优步、阿里巴巴、TikTok……许多新兴的数字巨头也走上类似的道路，积极投入这个指数型增长的世界，并力图掌握其中快速增长的秘诀。

对每个个体来说亦是如此。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必须用更短时间去试错，然后迅速地调整和改正，从而抓住涌现的新机会。美国科幻作家威廉·吉布森曾说过：“未来已经到来，只是尚未流行。”对企业家、创新者和领导者而言，指数时代无疑打开了一幅新的藏宝图，激发人们创造更大的财富和追求人生的意义。



本版编辑 杨啸林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“荷兰威尼斯”小村

康逸 王湘江

一座座木桥将整个村庄连在一起，餐厅、酒店、露营地星罗棋布，交通主要靠电动静音船，最吵闹的声音可能来自周围嬉戏的鸭子……在有着“荷兰威尼斯”之称的羊角村，人们常常发出“住在羊角村，人在画中游”的赞叹。

羊角村位于荷兰西北部的自然保护区内，其最大的建筑特色是茅草屋的芦苇屋顶。这种材料不仅符合人们对于环保的要求，还能让房子保持冬暖夏凉，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之一，当地政府鼓励居民保持特色风貌。

几年前，到羊角村的主要还是欧洲游客，如今羊角村的中国游客正越来越多。作为将荷兰羊角村带中国人视野的人，荷兰旅游局形象大使盖比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与疫情前相比，来羊角村的中国游客呈现出更多新变化和新趋势。与之前三四个小时的打卡游览不同，更多年轻人愿意在这里逗留更长时间，深入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，享受当地田园风光和慢生活。

为满足游客需求，羊角村专门开设了小课堂，介绍当地传统农业以及荷兰未来农业发展等情况。“我们还会介绍荷兰人擅长的水资源管理。”盖比告诉记者。

盖比说，很多游客认为，羊角村有不少东西值得学习，比如传统耕作方式、美食烹饪，甚至在建筑灵感等方面也有不少启发。

由于这些年频繁前往中国，盖比也对中国在环境保护、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印象深刻。盖比说，除了大城市，她还去过中国的许多乡村，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未来规划。“我发现大家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可以互相借鉴。”

盖比说，在这个有很多桥梁的荷兰小村庄，桥将各个茅草屋与主干道连接起来，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“通过这些桥，我们走向外面的世界学习，外界也由此了解了我们。这给了我很多启发：桥梁正是我们彼此都需要的。”

盖比的父亲威廉至今还没去过中国。他说，因为女儿工作的原因，他们一家人都很热爱中国，自己也读了不少中国历史著作，被中国璀璨的历史和文明深深吸引。现在中国对荷兰实行免签政策，他们全家打算今年12月一起到中国去，亲身感受中国的魅力。

今年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旅行家马可·波罗逝世700周年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成为很多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桥梁和窗口。“不了解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存在许多偏见、误解和嫉

妒，我们需要更多当代的马可·波罗，把眼下最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。”威廉说。

目前在荷兰工作的中国农业学者朱希对记者表示，她多年前在荷兰留学时，第一次来到羊角村游玩，便被这里悠闲自在的荷兰乡村风光深深吸引。她笑言，如今她已经记不清究竟来过羊角村多少次了。

近年来，中国游客以其庞大的数量和强劲的消费能力，成为荷兰的主要客源市场之一。荷兰旅游局指出，在所有到访荷兰的外国游客中，中国游客的消费水平名列前茅。中国游客不仅喜爱旅游和购物，还越来越重视当地这种可持续发展的

旅游方式，通过节约能源、减少废弃物和使用清洁能源等方式践行绿色出行。

2023年，中国成为荷兰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之一。荷兰旅游局相关报告显示，2023年，荷兰酒店共接待了17.7万名来自中国的游客，较2022年增长一倍多。该机构预测，随着荷兰之间增加航班，预计2024年到访荷兰的中国游客数量将继续增加。

（据新华社电）

